

目 录

临河李记德和泉的兴衰·····	政协文史资料室	(1)
百川堡屯垦的始末·····	刘培荣	(19)
山东移民村之简述·····	田宝玉 口述 刘培荣 整理	(29)
班禅召法佑寺之简介·····	巴拉僧 供稿 梁 杰 整理	(34)
傅作义在后套实施新县制前后之记述·····	刘培荣	(39)
冯玉祥五原誓师·····	武耀国	(58)
解放前后河套天主教活动点滴·····	邹国华	(60)
忆述河套地区哥老会与独立队之危害·····	刘培荣	(66)
哥老会及其暗语·····		
·····王致中 王天材 张彦彪 口述 樊登高 整理		(75)
关于孙殿英过境后套打宁夏之前后·····	刘培荣	(80)
河套水利沿革·····	王文景 遗稿 史明德 整缮	(84)

临河李记“德和泉”的兴衰

前 言

李记“德和泉”的创始人李振山（别号李三 垮 子）于清同治年间流落到临河，直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时将近八十年。在这一期间经历了光绪三十四年、宣统三年之清廷专制，到民国三十八年来的讨袁护法、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统治时期。从李振山安家立业，到李增荣（小名银科，别号仁甫）之发家致富，到败家子李元贞（别号干臣）手中，始将树大根深，名噪塞上的“德和泉”大部家业挥霍殆尽。李元贞也因罪恶累累，解放后在临河伏法。

李记“德和泉”的兴衰，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兹从以下八个方面逐一简述：

- 一、李记“德和泉”的起源；
- 二、兴家立业的过程；
- 三、土地占有和农林牧付概况；
- 四、整修水利之简介；
- 五、商业资本的铺开；
- 六、李增荣的葬仪；

七、败家子李元贞（干臣）的覆亡；

八、对当地的影响和毒害；

一、李记“德和泉”的起源：

开创人李振山原籍河北省枣强县李家行村人。在清同治年间，正当青壮年时期的李振山和二弟李振江三弟李振海，即投奔中岳嵩山（河南登封县境内）少林寺习练武术拳法。为时二年后，因学得少林寺拳法，便辞别师傅下山以保镖为职业。兄弟三人首次出马保镖是护送伊克昭盟杭锦旗王爷晋京朝圣后，由京起程路经张家口、大同绕道神木将王爷护送到旗府完成保镖任务，领得酬金后便告辞返京。第二次是承保清政府一位出任四川的知府途经山东兖州时，遇匪徒十数人打劫镖驮。李振山弟兄三人挺身护卫，终因寡不敌众，二弟李振江被当场击杀，李振山负伤败逃，李振海溜回原籍。而所保之知府亦下落不明。李振山怕追究刑事责任，因而窜到萨拉齐隐身。后来于同治年间跟随大户李红娃进入后套。李振山先给五原大地主王同春当长工。由于他和同伙在游戏中显示了两手武术，受到人们的喝采，并给他送了个山垮子外号。王同春得知李振山学得少林武术，不但让他担任保镖，而且还让他担任了牛犊头和管家。

在当管家期间，李振山巴结上了一伙蒙古贵族。当他认为有条件独立起家，实现发家致富的野心时，就摆脱王同春，投奔了蒙古贵族章盖，一方面对章盖百般奉承，以取得章盖信任，一方面又与章盖的老婆私通，因而获取了章盖两顶蒙古包，二百多只羊，四十余头牛，十五匹马，以及其它财产，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家业。以后又和一个蒙古女牧主拿林包图大臣的老姑姘居，取得对方的欢心和信任，进而接收

了那个女人的家产。这样李振山（山垮子）的家业就更大了。在临河县魏羊地一带有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即开始雇工，一面种地，一面放牧，过上了地主阶级的剥削生活。同时又包下蒙古贵族的十几顷土地，转租给佃户。这时李振山的家业，已发展到六十余顷土地，七十多头牛，三十多匹马，三百多只羊，可谓李家的初盛时期。

其时的河套平原，正如过去所形容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浅草见牛羊”的地方，四下杳无人烟，是一片荒凉的草地，红柳丛生，芦苇遍地，百里之内，只有一座喇嘛召庙。庙里的活佛和喇嘛整天只是诵经念佛，很少与社会上的人们接触，只有不当喇嘛的蒙人，才和汉人来往，彼此做些互通有无的交易。

李振山和李振海相继扎落在临河魏羊地，（今城关公社）和府谷人魏二处交很好。当魏二与强家油房的强二，因浇水放坝发生武斗时，李家兄弟为维护魏二的渠坝，打败了强二，从此李振山兄弟声威四扬，称强一方。除得到魏二对他的酬劳，还有那林包图大臣的老姑，将东至准格圪旦，西至大渠畔，南至魏羊地，北至丹达木头，约有近千顷土地，统统划归李振山承包转租。同时又倒贩蒙人的牲畜皮毛等土特产品，运往包头出售后，购销蒙人所需的茶、布、烟糖，往返双重获利，而拿蒙人的拳头，去打蒙人的眼睛。这时李振山在边客的介绍下，又与神木县知事的遗孀，结为续弦之妻，于清光绪十一年生一男孩，为和前房所生之李银娃相应，而起名叫李银科。并同原籍将家中老母及姊妹等人，也迁来魏羊地安家落户。（那时的临河仅是萨拉齐县五原厅所辖的一个区。）

光绪年间，阿拉善旗达王聘李振山弟兄到王府担任武术教练，因而把陶来图一带约二十余顷蒙地让给李振山经营，阿旗每年只要微小的一点报酬。李振山弟兄们在拥有大量土地后，急需开渠拓荒，因之接挖了兰琐渠，开挖丹达木头渠。为了扩大家业范围，寻找更多的财源，还在包头设立了“德和泉”字号，这就是李记“德和泉”的起源。

二、兴家立业的过程：

李振山开创家业的事迹，在后套地区来说，仅次于王同春。长子李银娃（官名李生荣）一生庸碌，尤其品德败坏，不齿于人。次子李银科（李增荣别号仁甫）是一个狡猾、善于钻营具有事业心的人。他有一套处世接物兴家立业的技能，从小就在父母的影响下，熟悉管理农牧业的方法。虽然家境小康，但李银科没有上过一天学，是个目不识丁的富家子。他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发家致富的局面，特别是善于勾结官府伺机霸占土地，对长工佃户能施以小恩小惠。自李增荣当家以后，到处钻营，很快和五原县垦务局长（其时临河属五原管辖）大地主伊新才结成莫逆之交。所以在垦务局放地的时候，他乘机买了八百顷地之后，又包下蒙旗干召庙、小召滩及马场地的一些土地，致使临河“德和泉”老柜（即现在的丹达公社水桐树大队）成为他扩大世业的策源地。李家到了李增荣手里，已发展到鼎盛时期。李增荣为了保全家业，壮大声势，曾拜马福祥（当时的绥远都统后调往宁夏）为干爹，并与马鸿逵王英结为盟兄弟。

一九一三年李柜筹借贷款，佃户、雇工出力，着手修挖丹达渠。李增荣采取因人制宜，恩威并济的办法，把一个跑

差的小徒弟李子英提拔为管家记帐先生，接替了付乐山的差事。直至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在李元贞（干臣）执掌家业时，才提拔郭永海为当家先生。在李干臣的手里，郭成为李记“德和泉”的总管家代言人。

民国十一年至十四年之间，河套地区的哥老会横行无忌，借帮会之名，行敲诈之实，为所欲为的到处扰害。但李增荣（银科）亦能加以拢络。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军队过境退往陕甘宁时，后套的哥老会兴风作浪，纠集乌合之众，成立起独立队。他们奸淫掳掠，拦路抢劫，到处“请财神”，（即绑票的代名词）。大户地富和稍有余钱的人们，一听见“请财神”这三个字，无不失魂落魄，毛骨悚然，就连一般劳动人民也害怕独立队，而李记“德和泉”则旁若无事，其中的奥妙很难使人理解。如从李增荣（银科）的处世哲学来剖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既要逢迎坐轿的官宦，也要为下拉棍的贫人，人有贵贱，各有用处，尤其不能得罪拉棍的人。如得罪下这类人，随时有打掉你前门牙的危险”，又如曾在河套逞凶一时的匪首杨猴小带有千余人马，自封为骑兵师长，听说“德和泉”有匹千里驹（闻名的走马），便派人去借。而李增荣则很慷慨地让长子李干臣亲自送马上门，以讨取匪首的欢心。再如对背上口袋上门要饭的乞丐以及大烟鬼之流的贫民，也不时给点施舍，用以解消对“德和泉”的仇恨。所以在“德和泉”东西两柜，皆有大伙房，东西顶头大炕可供百余人住宿，支应“穷汉”们吃住。在接官迎贵方面，百般讨好于人，民国十四年秋，临河开始设治，萧振瀛来临建政时，李增荣迎在“德和泉”接待，让出较好房间作为县署办公地址。由于李增荣殷勤款待，当划分临河以“永庆太平”

四个字的顺序划定为一、二、三、四区行政建制，李增荣在萧县长的提携下，担任了临河一区的董事。李增荣在政治上有了门路，相应地就助长了李家经济势力的扩展。自此李记“德和泉”进一步成为权贵盈门、财源兴旺的豪门巨富，步入了更加兴旺发达的新阶段。也可以说是李记“德和泉”在扩大土地发展农牧业的基础上，又大事进行商业投机活动、把李记“德和泉”引向了鼎盛时期。

三、土地占有和农林牧付之概况：

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为了开垦荒原，移民实边，指派贻谷为农垦督办。钦令达拉旗、杭锦旗报垦放地，故于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垦务局，掌理放垦事宜。计后套地区先后放垦三次，每顷地向挂领人只征收五十到八十元的地价，并发给土地执照分期交付，五年还清，而土地所有权则归私人所有。李增荣在垦务局三次丈放土地中，都不遗余力地设法购买，最突出的一次就买了八百顷，连同前后挂领和承包蒙地在内。约有二千二百余顷，每顷地为一百市亩，（上述顷数包括荒沙碱滩在内）分布于现在的临河、杭后、磴口三旗县境内。由于地多面广，鞭长莫及，而形成雇工自营地、包租转租地、佃农承种地等几种类型。并分设魏羊地，王爷地、东柜、西柜、九季、后束坝、郭延驹，小召滩，新台地，南台地，北台地，应四地，西牛惧等十几处牛惧，遍及临河、杭后、磴口的城关、建设、丹达、黄羊、白脑包、干召、小召、挑来图等八个公社的范围。就以临河丹达公社老柜附近的牛惧来说，计有南牛惧（今永胜大队）、七里生官牛惧（今新利大队），而魏羊地，公产地，分子地，王爷地，挑来图等处之牛惧，还不在于其内。仅丹达木头之地界，南至吴

马贵（今干召公社永丰大队），北至公产房世城西（今建设前进大队），东至兰琐河，西至黄济渠（今丹达永胜大队）延伸到邓泥圪卜白脑包一带，计可耕地面积将近一千顷。加上干召庙周围有地约六百余顷（包括荒地碱滩）魏羊地（今城关万丰大队）约近三百顷（可耕地一百八十顷）东小召承包之善召地四十余顷（可耕地约计二十几顷）水桐树大队自营地一百二十余顷，公产（即二里五）六十余顷。份子地挂名六十余顷，共计一千一百余顷，总计李记“德和泉”占有的土地，虽系二千余顷，但除了荒沙碱滩，无法耕种者外，实际能够耕作的土地，不过一千五百余顷左右。关于磴口桃来图一带之领地，因数据不详，未计算在内。

李记“德和泉”的常年自营地，约有八百顷（八万市亩）多是黄土拉亥河畔到兰琐河之内的土地。每年各个牛具雇用的长工，不下二百五十余人，农忙时雇用的短工，通常亦有五百人上下。每顷地平均产量，如以五十绥石计算年收获粮食可达四万石（每石三百斤）除去籽种及所有长短工等项开支约有一万石外，则可净余三万石之纯收入。

包租转租和自有出租土地大约一千余顷，承种“德和泉”的佃户，据说有五百余家，每顷地就以低租额十石估计，每年可收租粮一万余石。而每年所收获的粮食，除备耕备荒囤积一部分外，其余大批地从黄河运往包头出售。如民国十八年内地遭荒旱，粮价飞涨，每石粮食售价高达三十块银元，大发了一批“灾难财”。“德和泉”自备两只大船，从河路上运去粮食皮毛等，购回布匹烟茶及其它杂货，进行往返双重取利的生意。

“德和泉”所占有的土地，相当部分是从牧主召庙手里

包来的。例如包干召庙地一百多顷，一年只出二十四两银子，即可收取租粮五百几十石，简直是一本万利或无本得利。

李记“德和泉”在旧政权时代，就成为临河县的一大霸天，其拥有的土地，遍及永康乡（丹达木头），永宁乡（干召庙）永兴乡（城关魏羊地）永嘉乡（世成西）永灵乡（七里生官）等三分之一的乡村。在牧业方面，牛马骆驼羊成群。据不完全统计，有牛五百多头，骡马一百二十多匹，骆驼八十峰，羊一千一百余只，另外还有二百多头常年圈存猪。

在林付业方面，东柜西柜几个主要牛犊点，都有油坊缸坊粉坊碾磨房，以及铁木工房，分别责成专人管事。

在林业方面，计西牛犊树园三百余亩，丹达二百八十亩，魏羊地八十五亩。其它各牛犊的小量植树还不在于其内。另外在果木树的栽培上，丹达老柜试种了三亩海红子，亦不无收获。仅木材林的收益，每年亦不下一千几百银元。

李家大小四辈，总共不过十六口人，却豢养着大小管家，各种头目以及厨师丫环、老妈、裁缝、车夫、随从和家兵等约有六十余人。至于各个牛犊的管事头目，有外头（丈量土地收租粮）跑渠头（专管渠道浇水）下马头又分作站院头、管库头上马头与引入头（管出勤生产）所有这些人都是在李记“德和泉”的信任下，能够忠实为其效劳的“腿子”。

丹达木头李记的总柜筑有围堡，庄子的周围是一道高一丈，宽八尺的墙围，周长一里多。围堡的四角，修筑有岗楼。庄子共分三层院落，有房一百余间。最外层是长工们住的地方和大伙房牲口棚圈。西院是帐房、油坊、缸坊、库房

粮仓。东院是李银科（增荣）家属住的地方，门口设有家兵站岗，不许佃户与长工们随便进去。炊事分为三个灶，长工吃大灶，伙食粗粮淡饭，管帐先生和管事头目吃中灶，菜饭较好。李家大小人等吃小灶，每餐精米细面，猪羊鸡鸭，间或亦吃山珍海味等珍贵食品。

民国八年建盖水桐树庙，十一年大修改修为李柜的家庙，养活着和尚十二人，其中陈俊为当家和尚。

四、整修水利之简介：

民国十三年李家筹款集资金，在绥远都统李鸣钟的贷款支援下（这时马福祥已调宁夏），李银科担任经理，开挖了丹达木头渠，全长八十多华里，日出民工三百余人，连续挖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放水。丹达渠具有干渠的容水量，灌溉面积达一千多顷地，除李家受益外，对其它地户和佃农亦不无好处。

开挖三大股渠，此渠系李银科（增荣）、赵银富、田喜亭三股合资挖成，由马场地起，经临河县永圣、永嘉两个乡境至桃园公，渠长九十华里，宽四丈，深五尺，灌溉面积五百余顷，经连续几年之开挖，于民国十九年始告完成。

整修魏羊渠。宣统元年由魏二开挖，中间淤塞十余年之久，不能灌溉，后由李庆荣经理修挖畅通，该渠由塔尔湾起经永兴乡到临河城关西门外止，渠长二十八里，宽一丈，深四尺，灌溉面积八十余顷。

接挖兰琐渠，此渠原系天生壕，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由垦务局挖成。宣统二年由李振山（山垮子）管理，接续修挖。迨至民国二年李增荣（银科）担任经理，由永济渠口西起，经永胜、永宁、永康、永福、永嘉等乡，到达拉地

为止，渠长七十五华里，宽四丈，深五尺，灌溉面积九百余顷。后来又将丹达渠、兰琐渠改建为合济渠，李增荣任经理。并取得陕坝天主堂邓神甫的同意又从黄土拉亥河中段开口，修挖了一条支渠，以利用该河的水源，增加了李家水浇地面积。李增荣在水利方面，所以能够重视乃因从后套地区的实际出发，农业生产以水利为第一要务。而对所有渠道的洗底加背清淤等，德和泉为了自身利益，势必尽力而为。

五、商业资本的铺开：

李增荣（银科）在掌理家业期间，除在农业、牧业、付业、林业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外，并为广开财路，在河套地区铺开的商店，计有包头的天义祥，而“德和泉”垫财以袁天蚩出名开设的永丰泰粮店，以李银科为财东开设的义隆祥、永合泉、复兴和粮店，亦有其股份。

在临河“德和泉”老柜分设油坊三座、碾房两座、磨房两座、缸房一座，总之：六陈行的生意样样皆备。

在临河的商号，“德和泉”投资或为财东的，计有元兴西、蚨来号，乾泰兴与同合酱园等四处；在米仓县以“德和泉”资金开设的商店有德义泉；在陕坝开设的有义合成，以胡耀辰、武耀国为掌柜；在五原亦开设有两处买卖，由女婿党行先经营。

李记“德和泉”商业资本的铺展方面，不仅在后套范围，其做生意的地区扩展到京包线的张家口，以及天津东北一带。

在民国二十五年前，未贯彻禁烟法令时将此地所种的鸦片烟除李家自种收获的，还以每两大烟土一块银洋的价格，大量收购后贩运到东北等地出售，每两可卖二十五元以上，

取得巨利，扩大资源成为后套地区的唯一暴发户。李记“德和泉”的发家致富是以土地剥削和商业投机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获得日益增长的财富。

其次除临河等地的房产外，仅包头市的房产计有口袋房巷所买毛织厂的院落一座，花银一万两，买德和长荣职成绒毛店的前后两套大院，花银五万两。在包头召梁买房一百余间，南圪洞买房二百十一间，共花银一万二千两。买天德成乔家的院落，东西两个套院花银三万余两。另外东河区马王庙街路南有一套三大院，东门大街的两座院落，买价不详。所有这些院落房间，每年可获得房租亦在五千银元以上。

六、李增荣（银科）的葬仪：

李增荣在过六十寿辰时盛况空前，宾客盈门，唱了七天大戏，送寿礼的络绎不绝，仅幛子就收了三百余块。过寿不几年，他患了半身不遂病。李增荣为了安排后事，专意开了一个砖窑烧砖砌墓。其葬墓按三代序列建成正墓配墓大小十多个墓坑，每个坑子都是用砖拱起来的，正墓面积有三间房大，全以砖盖成。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当李增荣未死之前目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浪涛，将要席卷全国，反动派已面临崩溃之时，所以李增荣把已往多年来积欠“德和泉”粮款的户头因无力偿还，而将欠帐一笔勾销，帐目全部焚毁，以免后人索要。据说烧掉的帐目，债户欠粮约三万石之多，欠款计有二万几千银元。李增荣此一做法是迫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并籍以收买人心。

李增荣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八月病故，为其办丧事的场面比已往过寿还要庞大。当他未死之前，就由包头找来了几个画匠裱糊葬品，光做纸火就用了将近两月的时间，

什么金山、银山、童男童女、纸人、纸马……数也数不清。

李增荣的丧事整整办了“七七”四十九天。到十月十八日发引，每天都有专人守灵。和尚、道士，天天轮流念经。出殡前后半月内天天杀猪宰羊，大办宴席，吊丧的人络绎不绝，计有四千余人，据说傅作义、马鸿逵还有代表参加。灵前及村落布满挽联和人们送的黑绸布幛子，灵棚全用白布扎采。出殡那天，李增荣的灵柩，用四十八个人，以龙头凤尾杠抬着，前面的殡仪队，开路菩萨打路鬼、童男、童女、纸人、纸马、金银山、静踱楼、金银斗、摇钱树、长钱幛子、绣球幛子、雪花幛子、四合头院、其名目繁多，无以数计，一个接一个的已排出了三里多，直到沙丘墓地，但后面的灵柩，还未挪动一步。和尚二十八人妆成二十八宿，道士数人，鼓乐三班，吹吹打打，送葬的亲友哭哭啼啼，送殡的行列从李增荣家院落，直到沙窝子葬地，长达三里。

在治丧期间，常素庙、水桐树的和尚，干召庙的喇嘛，四村百舍，各方友人，前来奔丧者川流不息。对来人就食还发了食证从早到晚流水席接续不断。李记“德和泉”为了李增荣（银科）的治丧，据不完全的统计，耗费资金折合银洋在一万元以上。拿后套各县来说，是空前豪华的丧事。尤其搭台唱戏，大放官赌七天，筱月仙的山西梆子，昼夜演出，中间还有二人台插曲，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官方还派去警察十人，士兵两班，给他家维持场面秩序。

七、败家子李元贞（干臣）的覆亡：

李元贞别号干臣，其弟李国贞，都是李增荣（银科）的亲生子。李干臣二十岁以前，在包头回民小学及初中读书，二十一岁改入黄埔军校，但未入校接受军训。民国十六年

(一九三七年)后，代父李增荣，担任了临河县财政科长，为时不到二年，李干臣调任临河县教育局长，以后又调任水利局长，永济渠整理员。抗战前曾是伪国大候补代表，名义上任过马鸿逵十五路军参议，以及绥西区防付司令。抗战时期接受了十七集团军总部参议的虚衔和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团长的官职。一九三八年门炳岳任绥西警备总司令时，曾让其自筹人马，委以抗日游击支队长。一九三九年冬末，日寇入侵后套，揭开五原战役之序幕，李干臣联络当地吕宝山部属田有明等人，组成地方武装，从新公中扰袭五原。战役结束后，解甲还乡。随之跑到宁夏马鸿逵那里躲藏避难。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傅作义东去接收后，李干臣才回到临河被选为首届县参议会付议长。

李干臣自幼就有野心向上爬很想登上政治舞台，显露身手。但由于父亲李增荣的阻滞，未能得志，因而几次招兵买马都是空有其名，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李干臣一生享乐成性，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大有花花公子的派头，虽然娶有大小老婆，但有时还要嫖暗娼，逛窑子，寻花问柳。在日常生活上，奢侈挥霍讲究排场，不时向外地去购山珍海味等食品，滋补身体。尤其好在酒席宴前以酒司令自居，充当饮酒好汉。对赌博更加热衷，压宝、推牌九、打麻将样样精通。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仅仅四年的时光，李干臣就将包头的家产，挥霍大半。如在古城湾赌博，一次就输去银洋数千元。又加为母过寿大事铺张，亦耗费了巨额资财。抽大烟吸料面，李干臣早已习染成瘾，经常和赵钰、崔汝骥等嗜吸鸦片烟的人们混在一起，结成狐朋狗党。

李干臣身高六尺三，体重二百一十余斤，在后套地区是

独一无二的肥大型人。出门骑的是一匹大走骡，随带护身的武士一人，武文斌就是跟随他的其中一人，他东跑西逛游山玩景，整天追求个人享受，不理家政，抱着高高山上晒太阳，好活一天算一天的人生态度。

一九三九年，傅作义来套主持绥远军政，强调禁绝“烟、赌、脏”的政治要求，这对烟赌成性的李干臣来说，感到很受束缚，唯恐绳之以法。所以随带武殿臣携带了部分现金，细软财物从陕坝出走，跑到宁夏马鸿逵那里，借助干爹的护身符，在银川为所欲为，一直呆到抗战胜利后，傅作义东进察绥又加其父李增荣卧病不痊，才又回到临河掌理家业。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秋，李增荣病情恶化，医治无效，终于寿终正寝。李干臣在办理其父的丧事上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迨至李增荣发引，对家事稍作料理后，即去包头进行大拍卖，用以满足其荒淫无耻的享乐生活。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将要结束，平津战役的序幕业已揭开之时，李干臣看到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因而回到临河收拾家产，装运骆驼十余峰，马车七辆，将丹达木头老柜所有的贵重财物，以及枪支弹药等，星夜运往宁夏王爷一带。

一九四九年随着蒋家王朝的垮台，李记“德和泉”和其它地主阶级一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九五〇年在党和人民政府宽大政策的号召下，李干臣才返回临河，并假惺惺的向区干部提出加强农村治保，组建集体农场的建议。并以开明士绅参加了临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党委李桂芳再事强调认清形势，打消顾虑，并反复阐明党的政策。会上李干臣虽然伪装积极，但会议之后即砍伐树木，转移五大财产，

准备到外地隐居。当土改工作队进村时，李干臣仍在外地流窜。一九五〇年秋征和五一年减租反霸时，从李干臣家里查获出暗藏的手枪一支步枪一支，以及埋入地下的大烟土两箱，银洋一千多元，银子一罐，还有绸缎等好多财物，因而将李干臣扣捕归案。

一九五二年元月二十一日，提交群众大会斗争后，依据镇反条例将李干臣执行枪决，结束了李记“德和泉”三代在临河的建建势力。

镇压李干臣是由于他私藏枪弹，破坏生产，解放后继续进行不法活动，以及查获反共救国军付司令委任状等罪行。其它人等，如他母亲现住包头，大老婆畏罪自尽，二老婆管制改造后另嫁他人，胞弟李国贞判处劳改刑满释放后，在包头就业，所遗子女计有黑翠、旦旦及侄女连连等。解放后，在党的阳光雨露下，已抚养成人。

八、对当地的影响和毒害：

任何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而李记“德和泉”也不例外。从好的方面来说，对移民临河开拓荒原，修建部分渠道上，起到一定作用。尤以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四处遭荒旱，饥寒交迫的穷苦人，离乡背井，卖儿弃女，逃荒后套。而“德和泉”东西两柜均开锅放饭，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后套各县风雨失调，普遍欠收，在抗日救亡号召下，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的去当兵，李增荣尚能慷慨输将，捐献米麦一千绥石（三十万斤）从而相应的也减轻了当地的摊派。一九三九年（民国十八年）傅作义率部进套，筹措军粮时，李增荣（银科）首先捐献小麦五百绥石（即十五万斤）傅作义为此送给“捐粮救国”的巨幅牌匾，李增荣

平素对待贫民和困难户，亦能施以借贷，骗取好感。

从坏的方面去看，李记“德和泉”勾结官僚政客，土匪把头 and 封建地主站在一条线上，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有力支柱。尤其李增荣在病重期间，托陕坝王乐天由中美训练班请来美国大夫看病。佣人李锦明为讨取来医的欢心，竟把本村赵富的老婆弓秀英（又名弓玉莲）找去，充当女招待，有意让美国大夫去玩弄。坚贞不屈的弓秀英，识破其圈套，加以拒绝，致使此一策划未能得逞。对此弓秀英同志在斗争李干臣的群众大会上，声泪俱下，义愤填膺地控诉了李家父子的罪行。

再加李生荣（银娃）一生庸碌，品德败坏，在乡里心目中早已对他深恶痛绝。李生荣（银娃）自认为有钱有势，胡作非为，可是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群众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复加李记“德和泉”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以前，为图谋暴利，广种大烟，同时进行贩运鸦片的不法生意，不但阻滞了禁烟法令的贯彻，还毒害了无数的贫苦人民。而在做蒙人牧民的买卖上，不择手段的拉拢关系，讨取便宜，对蒙汉民族团结，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民国十六年前后，李银科（增荣）以一区区董职位，假公济私，把十几名区兵，二十几支枪，用作护卫家业的私有武装。抗日战争前两年，还雇用家兵，自备武器，计有盒子枪两支，自来得两支，步枪七支，八音子一支，土炮四门，成为声势烜赫的西霸天。特别是举办李增荣丧事时，正值秋收农忙之际，开台唱戏，大放官赌，不但影响千家万户的正常生产，尤对当地及后代流毒非浅。